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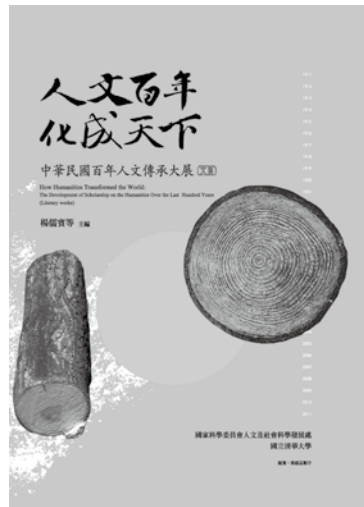


東亞視座下的臺灣人文科學

楊儒賓*

一、

經過一年半的準備，國科會成立五十二年來第一次推動的人文科學展覽活動：「百年人文傳承大展」即將開幕，兩本圖錄也即將印出，一切已就緒了，我卻近鄉情怯，心裡不太踏實。不踏實一半緣於對實務的陌生，不知道事情會怎麼演變；一半也緣於對整個展覽的定位仍覺不足，總覺得還是缺少了什麼東西。更關鍵性的原因當是心理的壓力，這檔展覽不但是國科會人文處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大展，更由於國科會即將改為科技部，此檔展覽很可能也是國科會人文處最後的一檔展覽，所以也極有可能是半世紀來人文處推動的唯一一檔展覽。參與這檔展覽的學門不少，人文處人文領域的七個學門全部參與在內，連宗教領域的學者也以準學門的身分共襄盛舉。人文八檔，濟濟一堂，參與者多是相識多年的學界舊友，主事者很難不會感受到一種特殊氛圍的壓力。



這檔「百年人文傳承大展」希望以文物來呈現百年來中華民國一臺灣的人文發展，筆者所以用「中華民國一臺灣」這樣的記號，乃因「中華民國」與「臺灣」在近代史上的行程中，關係複雜。中華民國成立時，並不包括臺灣，等到臺灣融入中華民國時，很快地，竟演變成中華民國融入臺灣。「中華民國一臺灣」的概念之構造形式有些海德格語言的樣貌，不怎麼中文，但這種異國風味的連結方式似乎比較能描述百年來臺灣的人文研究之走向。我們這檔展覽有個明確的歷史圖像，此即中日雙源頭——雙源匯流——在地轉化的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

三階段發展。此三階段以 1911、1949、1987 三條年線當作功能性的區隔。宏觀的歷史敘述難免籠統，一條中華民國—臺灣百年發展的主鋼索，加上三條象徵意義的歷史斷代切線，無疑是高度詮釋下的圖像。不同的詮釋觀點一定有的，不足之處也一定有的，我的不安一半也因此緣故。

「1911」此數字源自辛亥革命，「1949」源自國府遷臺，「1987」源自臺灣解嚴，這三個數字明顯的帶有濃厚的政治內涵。人文學門的朋友共同推動這檔展覽時，大家其實有很明確的運作原則，即此檔展覽是依學術邏輯展開而帶有文化傳播的意圖的，我們是在臺灣發聲，但不是為任何政黨發聲。我們之所以選擇這三條帶有政治內涵的紅線，實有所說。因為上述三條紅線其實是象徵性的，它們各象徵一個重要的學術過程。「1911」的意義在於新舊知識典範的轉移，如果要取更精緻的界限來論的話，也許 1905 的取消科舉制度更具象徵意義，因為從隋代創設科舉以來，一千三百年來的東亞知識分子受此科舉文化影響極大，科舉制度可以說是調動東亞社會運作的一項重要機制。

「1949」之所以重要，在於伴隨國府渡海而來者除了黨政軍的因素外，更有大規模的文化力量，此文化力量融入臺灣原有的結構後，產生了有意義的學術蛻變。然而，此文化力量之南渡並非限於 1949，也不是起於或止於 1949，事實上，這個過程可以說從光復的剎那即已開始。至於「1987」此數字所以重要，乃意指戒嚴對文化的迫害業已在法的層面上解消了，但此解消並非始於蔣經國的宣布，而是長期演變的過程所致。宣布解消戒嚴與其說是臺灣文化自主性的「因」，倒不如說是「果」。臺灣在宣布解嚴前，已蓄積了相當大的反對運動的成績，這些成績具備了再生的能量，蔣經國也是在半被動、半主動的情況下展示這項遲來的行動的。

然而，這三條紅線雖是象徵性的，每一條象徵性的紅線都橫跨了一段時間演變的歷程，但無疑的，這三個數目字的意象最突顯，它們各有成為某一時期的象徵的標誌之理由。由於政治具有壟斷一切資源的特色，加上臺灣原本處在政治過渡動員的演變歷程中，所以政治事件的意象最具公共性，以這三條政治意味濃厚的紅線作為功能性的劃分，遂也有方便之處。

中華民國—臺灣百年的人文發展就時間而言，並不算長，但就內涵的劇變而言，其變化之烈可能超過千年來的任一時期。即使從臺灣島內的歷史衡量，它的變化幅度之大，應該也超過以往三百年的任一階段。更重要的，我們現在仍處在後解嚴的情境，戒嚴時期的歷史影響仍未消逝。甚至於拉長距



離，我們事實上還可說仍處在後科舉的歷史過程中，新舊知識典範的轉移工程仍在建構。因此，不管就歷史的回顧或就未來的展望而言，我們都需要對這段曖昧的歷史有更清晰的認識，否則，一切的規劃都不好談。

上述這三條紅線的意義當然是相互貫穿的，每條紅線雖然都可以串起一堆相關的文化內涵，像科舉—書院制度的崩潰與新式學制的興起，這樣的工程有多重要，需要多少宏觀的藍圖與細工作活，才能勉強摸個底，但顯然箇中底蘊待闡發者猶多。解嚴後的人文學術發展之複雜，恐怕也大有可觀，但不明者仍然不少。無疑的，這三個時期的每一時期的個別意義都需要放在整體的結構中才方便找到恰當的定位。這三個時期的意義是相互關聯的，但我個人傾向於以「1949」年作為軸心，串起兩頭。由於「1949」的高度政治爭議性，我的選擇顯然不符合一些朋友的期望。但排開一些語詞的糾纏，我相信彼此間的差異恐怕不是那麼大，我有所說。

二、

歷史上的 1949 年注定是要被詛咒的，確實也是難以澄清的，它有複雜的歷史情結。在此年前後，小小的一個島嶼一下子湧進了五、六十萬的軍隊，以及大約相等人數的公教人員與外省百姓。對於一個剛從大戰劫難中躲過，又剛從二二八屠殺中走過的島嶼子民來說，這百萬人口的負擔不可謂不重。這群來自陌生祖國的殘兵敗將、流離百姓到底能代表什麼？它顯然是國共內戰下的產物，是外加於當時臺灣社會的事件：臺灣社會在未被徵詢的情況下，被迫承擔這件歷史的重擔。1949 的事件何所為而來？它代表什麼意義？一切的問題都是從這樣的疑問開始展開的。

疑問是許多尋常百姓的疑問，但對充滿責任感的國族論述者而言，1949 的意義卻是再明確不過了，至少曾經是很明確的。對左派的中華民族主義者來說，1949 是革命勝利的象徵年分，1949 後的臺灣則是革命尚未徹底成功的殘餘物。按馬克斯主義史家的定義，1949 革命是無產階級移動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大事業。在 1949 新中國成立的國慶後不久，胡風寫下了〈時間開始了〉這首氣勢澎湃的抒情史詩，這首史詩描述另一位「詩人」的偉大貢獻道：「中國人民底詩人毛澤東 / 在中國新生的時間大門上面 / 寫下了 / ……『一切願意新生的 / 到這裏來罷 / 最美好最純潔的希望 / 在等待著你！』……今天 / 在你新生的這神聖的時間 / 全地球都在向你敬禮 /

全宇宙都在向你祝賀。」〈時間開始了〉與其說是政治詩，不如說是宗教的啓示錄，毛澤東以「世界精神」的救世主姿態降臨中國，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革命中的一環。它不只帶來中國的解放，它還代表一種人類此特殊種屬的救贖，所以全宇宙都要來祝賀。時間是一切經驗成立先決條件，1949 此時間基準點之前的經驗都需要重估，被 1949 年革命此神聖事件通過的地區才能聖化。1949 之後的臺灣乃是國民黨反動勢力的盤結，解放臺灣因此有它的神聖意義。

對臺灣民族主義者來說，1949 則是臺灣人民再度遭受外來政權壓迫的一段傷心歲月之疤記。臺灣民族主義者對臺灣的詮釋基本上是從一種絕對的臺灣內部觀點所呈現的史觀，臺灣人民渡過黑水溝，經歷重重困難，來到臺灣。此一經歷被視為揮別苦難的中國，追求一個新的自由樂土的偉大冒險。在偉大的開拓過程中，臺灣人民不斷受到外來者的統治，他們的主體性無法彰顯。在這種認知下，1949 年國府撤退來臺，它實行戒嚴，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剝奪憲法賦予人民的諸多權利，此事件被定位為外來者的壓迫事件。國民黨政府與戰前日本的統治者沒有太大的差異，差別只在日治是異族殖民，而國府統治是同族殖民。在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一書中，史明即指出 1949 年國府撤退來臺之後，臺灣受到「殖民地的、封建的、商品的」三重的剝削。李登輝在〈臺灣人的悲哀〉此一轟動一時的文章中更明確的將國民黨定位為「外來政權」，而他像摩西，要帶臺灣人「出埃及」。李登輝的說法所以會在臺灣不同的族群之間引發正負兩極的熱烈回應，我們不難想像而知。

上述的兩個史觀都足以成說，但我相信如果換另一種角度，也就是換另一種歷史縱深更長的角度，同時也是社會縱深更廣的角度來看的話，1949 也許有另外的一副面貌。就歷史縱深的角度而言，我不免好奇：一個以中國格局自居的政權流亡到臺灣來，它至少在行政結構上曾經維持了一個國家的局面，而且幾乎有三十年的時間，得到國際的承認，承認它是代表中國的政權。在後三十年，它雖已失去國際的支持，但仍獲得少數國家的認可。而且至少作為一個等同國家的政治實體這樣的身分總是存在的，再怎樣的強權政治當道，我們也想不出有哪一個國家想將臺灣的政治實體之現實否認掉的。這個長達一甲子的國家意識是臺灣史上的新經驗，明鄭與「臺灣民主國」都不曾提供這樣獨特的實驗。一個長時期在國際上與中共糾纏主權問題，也長時間在內部與本土勢力爭相定義國家屬性的意識，它難道只是負面的燙手山芋



嗎？這樣的國家意識與臺灣的形象一樣難分，這樣長期糾纏的「國體意識」出現在臺灣的歷史舞臺上，兩者在國際政治實務的操作上幾乎可以說是同卵孿生兒，它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

另一個和 1949 年相關聯的社會縱深議題，乃是 1949 年的內容難道除了殘兵敗將、遺老遺少及一連串的白色恐怖政治之措施外，難道其他隨國府來臺的人員或物力都沒有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嗎？它們的意義和國府領導者的企盼是否一致？在來臺的六十萬外省居民當中，他們到底給臺灣灌進了什麼樣的內容？我們除了可以從經濟或社會的角度衡量之外，是否還可發現更結構性的底層因素？如果這一群文化素質上算是相當不錯的人員，再加上中國格局下的一些重要文教機構，再加上史無前例的大博物館、大圖書館同時湧進一個地區，這個地區基本上又有一甲子安定歲月提供了其文化滋長茁壯的土壤，那麼其成效該如何計算呢？它們有沒有可能發展出 1949 事件雙方肇事者——國共兩黨及臺灣人民事先都無法想像得到的豐碩成果呢？

歷史事件的歷史效應和當時主政者的意圖可能是不相干的，黑格爾和王船山都提過意圖與結果不一致的歷史弔詭現象，「天假其私以濟其公」的命題確實可以用來解大歷史變革中一些梟雄政客所起的作用。通常這種詭譎的歷史效應要放在較長歷史縱深之後，其結構才可以顯現出來。1949 的象徵太複雜，「只爭朝夕」是不夠的，拉長時間，我們如從臺灣史上「前 1949」與 1949 兩波移民的共同屬性，亦即漢民族的觀點著眼，也許可以拉出另一條線索。

我將 1949 年的政治難民移民潮放在漢民族南移的論述架構下，並不是什麼新穎的看法，毋寧相反，此說法應當是談論中國文化史的一種很流行的論述，這種說法大概可以稱為中國文化南移說。錢穆、內藤湖南等不少中國史學泰斗皆有此說法，在這種論述結構中，永嘉（311 年）南移、靖康之亂南宋康王（宋高宗）渡江常被視為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代表性事件。漢民族南移的趨勢始終是存在的，永嘉之亂與靖康之亂的規模是否一定比其他時期的移民數量來得大，事涉專業，個人毫無資格妄讚一辭。但這兩個年分所以特別突顯，我相信和代表政權正統的南移及對後世的影響有關。永嘉與靖康之後的中原政權南渡，應該是對南方的開發起了很大的作用。

近代中國發生這種正統政權遷移而又帶動移民潮的事件者大概有兩次，一次是 1937 年國府對日抗戰之西移與南遷，一次是 1949 年國府內戰敗北，渡海南移。馮友蘭於抗戰勝利後，寫下著名的〈國立西南大學聯合紀念碑〉，

碑文中提到國史上有四次大南渡：「晉人南渡，一也；宋人南渡，二也；明人南渡，三也；吾人（按：抗戰時期之中國百姓）為第四次之南渡」。抗戰確實是中國史上少數偉大的史詩，其整體規模之大，人民遷移之廣，歷史影響之遠，很少歷史事件可以比擬。尤其西遷與南渡後還能因勝利而北返，馮友蘭更是譽揚不已。但如從漢民族之移民史觀點考量，我個人認為抗戰西遷的影響恐怕比不上十二年後的渡海入臺。抗戰時期，中國居民、文物、機構的西遷雖然浩浩蕩蕩，它們合構成一篇壯闊的史詩。但就時間而言，基本上仍是暫時性的，抗戰一勝利，就復員且復原了。

渡海事件不一樣，論格局：流離之廣、死亡人數之多、國際局勢之複雜，恐與抗戰遷移事件不相上下。國共雙方在三大戰役中動員的兵力之多與死亡者之眾，不要說放在抗戰的格局下衡量，即使放在二次大戰的整體戰場的觀點下定位，都是名列前茅的。但論遷移的時間之久及文化變遷的意義之深，渡海事件的影響應當會更深遠。因為經過一甲子的沉澱醞釀，渡海事件的因素和臺灣原有的因素匯合涵化，它已相當合理的結構化了。1949年是重層疊密的象徵年分，以災難的眼光視之，它確實是個政治、經濟、軍事的大災難，反對黨長期的批判是有依據的。但我相信從文化的觀點看，1949來臺的因素是大災難中帶著天大的禮物，禍福相依，但禍福兩者不可等量同觀。因為災難是事件性的，它會逐漸淡化，有一天，在藍色與綠色小豬的包容中不會再是主要的政治議題。但1949的禮物是結構性的，我們很難想像抽離掉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歷史博物館、中央研究院以後的臺灣文化地理面貌；我們也很難想像抽離掉張大千、溥心畬、于右任、錢穆、牟宗三、徐復觀、李濟、梁實秋等人的影響以後的臺灣文化界；我們同樣難以想像在臺復校的校友對清大、交大、政大、央大、輔大、東吳等校的專情有多深。上述這些因素都曾是1949之前的大陸符號，有些還是現在中國的名牌之代稱，如故宮、清華。但鬧雙胞又何妨，又不是不能區隔，現在大概沒有幾個人會認為它們不是臺灣的因素。

如果經過一甲子的生根土著，上述這些文物、文教組織、文化巨人已是臺灣內部的成分，現在是，以後也是，那麼，我們也許可以從另外一種角度界定1949與臺灣現代人文學術的關係。如果從文化南移說的角度著眼，那麼，漢人移民臺灣可以視為一個較長期進行的事件，四百年只能取其概略而已。在這種移民的過程中，當然有些重要的歷史轉折點，1661年的鄭氏入臺



或 1945 年的臺灣光復自然也都是指標性的事件，但論人文加持的力道，1949 的格局還是最大。臺灣移民史是首不斷攤展潛藏內涵的集大成樂章，八音齊奏，前後迴盪，臺灣史上不同階段的漢移民都是整體樂章中的不同音符。臺灣包容了不同階段的苦難渡海者，包容的主體是臺灣的大地與連綿不絕的大地子民，島嶼上不同階段或不同方言的居民只能有互相包容的承諾，而不具備誰包容誰的問題。

當 1949 的歷史災難隨歷史的流變而逐漸淡化、甚至可以有有意義的轉化時，1949 的文化加持力道卻因融入臺灣的文化風土而隨著歷史的縱深同時土著化，土著化的結果使得我們有理由將 1949 年大陸南渡的因素轉看成臺灣內部的成分，評價此渡海事件的價值高低遂可視為臺灣內部的自我評鑑。我相信這種土著化的結構性因素會越來越明顯，而這種土著化在我們臺灣下一步的人文學術的發展上會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三、

1949 年的歷史內涵很複雜，很難透明地評價，歷史敘述與歷史判斷都非我所長，外行者原本不宜介入複雜的歷史現象之解釋。但因為此檔展覽，筆者別無選擇，只能跳入漩渦。筆者反省臺灣百年的人文發展所以不能不介入此一關鍵點的諸種爭議，乃因 1949 此象徵的年線具備了縮結以往的歷史發展與以後的歷史開展的樞紐。

依本檔展覽的定位，「1949」的意義在於雙源匯流。在臺灣這塊島嶼上，東西匯合，海陸交叉，因緣聚合，多滋意外。我們常因悲劇地發生卻又喜劇地收尾，也偶因始料未及的驚愕而又收到始料未及的驚喜，我們不知不覺中竟匯聚了近代日本—近代中國的學術建制。現代學術建制是現代國家精煉其力的產物，是整體國力的展示場，臺灣人民在參與現代人文學術的過程中，起初都不是主動發起的，但後來的發展卻不是被動配合的。由於這種匯流的特性，臺灣人文學界遂比東亞其他地區更佔有一種獨特的位置，它具有一種綜合的異質的內涵，它的殖民的現代性反而使它蓄積了更多的能量。

「1949」蓄積的能量在 1987 年的解嚴後，其作用應該越來越明顯。我們的展覽對 1987 的定位是在地發聲，其特色是本土化、兩岸化、國際化三化同時發展。由於之前的戒嚴體制同時壓抑了本土的論述、現實中國的論述，對歐美的吸收也有高度的選擇性，它全面性的與人文學界為敵。一旦這個高

壓的機制挪開以後，可想見的，原本被壓抑的因素一定會跑出來。但除了這「三化」的顯性結構外，我們還看到一層更深隱的因素，此即1987年以後的人文發展，不知不覺中會呼應第一期雙源頭的作用，亦即一種可以照顧各區域特殊性的東亞論述可能會再起。

解嚴後，本土化、兩岸化、國際化浩浩同流，在此巨流河中，「本土」、「兩岸」、「國際」的內涵可能需要慢慢的重新定義。我個人傾向在未來的歲月中，中文很可能會變為更重要的國際語言，華人文傳統很可能會被賦予體現「中國興起」或「東亞興起」的詮釋功能。這一波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重組，可說再度回應了19世紀末至二戰結束前日本所扮演的角色。京都學派學者參與在內的「近代超克論」深沉的反應了東亞在近代世界史流程中不甘於被定義，而思求有以共構秩序的渴望，我相信臺灣的人文學者有機會重演七十年前扶桑學者搬演的戲碼，但也有機會有意義地超克之。因為，我們的歷史積澱具有強烈的東亞性格，臺灣的本土化的內涵同時也就帶有東亞化與國際化的因素。從深層的結構來看，臺灣百年人文研究的歷程不妨視為東亞因素在此島嶼的整編醞釀之歷程。

我們的展覽會出一套圖錄，一冊為文集，一冊為展覽作品集，這兩本圖錄是人文處推動的第一本展覽圖錄，很可能也是最後一本。我們的圖錄內容和筆者設想的思想藍圖不完全相同，因為每個學門各有關懷，入手各異。所以即使在極相近的大架構下，仍會有相去懸殊的詮釋。我很感謝國科會人文學門這些朋友的幫忙，和他們相處真是愉快。這些朋友巧思慧解，各具手眼，竟能於窘迫的條件下，從容翦取百年流光的吉光片羽，拼成一段段燦爛動人的歷史錦繪。本圖錄的原始目的是要獻給臺灣社會的，但個人認為如保留下來作為一段大家共同記憶的剪影，也非常說得過去。

展期訊息

本展將分別辦理北、中、南三場展覽：

臺北場：展場為國立歷史博物館，展期為本年11月22日至民國101年元月8日。

臺中場：展場為中國醫藥大學藝術中心，展期為民國101年2月22日至4月10日。

臺南場：展場為國立台灣文學館，展期為民國101年3月9日至4月15日。